

生产与人口的集中促进了经济增长吗？ ——来自日本的经验和教训

陈利锋¹，范红忠¹，李伊涵²

(1.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2.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日本存在较大的类似：生产与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中。因此，日本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生产与人口的集中真的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吗？本文采用相关数据对日本的情况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发现生产与人口的过度集中对于日本经济长期衰退存在较强的显著性作用；而汇率的变化对于日本的经济衰退却不存在显著作用。因此，我国城市化过程应吸取日本的教训，适度控制大城市规模和支持中小城市的发展，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城市化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汇率变化；经济增长；过度集中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2)06-0070-07

Does Production and Population Over-concentratio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 Lessons from Japan

CHEN Li-feng¹, FAN Hong-zhong¹, LI Yi-han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2. Bei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Labour and Social Securit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similar to Japan: production and population concentrate in big cities. So the lessons from Japan may be helpful for us. Is over-concent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population helpful for growt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 this paper shows that over-concentration h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Japan's recession in the long time. And the change of exchange rate has in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Japan's recession. The result argues that, China should control the scale of big cities reasonably,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medium and small-sized citi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Keywords: change of exchange rate; economic growth; over-concentration

收稿日期：2012-06-18；修订日期：2012-09-25

作者简介：陈利锋（1982-），湖北黄冈人，华中科技大学西方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货币理论与政策、贝叶斯计量经济学、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

一、引言

自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因而在研究者中形成了一种认识：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是由于日本的汇率制度改革或者汇率变化造成的。在国内，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王义中^[1]与金雪军^[1]等都持类似的观点。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很多学者都将日本汇率制度改革看成是一种失败的教训，往往谈及汇率制度改革就谈虎色变。但是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真的是汇率制度改革带来的吗？已有的研究往往停留在研究汇率本身，没有深入考察其他因素的作用，而经济现实是纷繁复杂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单独研究汇率本身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得到的结论往往很难令人信服。同样，如果依据以上认识，认为汇率对日本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这种影响持续了几十年都没有出现转折或者衰减呢？以往的文献并没有就此展开研究。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通过构建经济计量模型，同时考察了汇率变化、集中度、劳动投入、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等因素对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汇率变化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是负向的，但是却不显著；而集中度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率却存在显著性影响。为了对以上研究的结论进行验证，本文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对这一模型进行估计，研究的结论无一例外地支持了以上论断。

那么为什么汇率的变化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呢？通过计算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仅接近 -0.08 ，即二者之间互动的趋势并不明显。另外，汇率的变化对于一国经济的影响很难大到足以使一国经济出现长达十几年的低迷。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因素究竟是汇率变化还是其他因素。

与已有观点不同，笔者发现，集中度对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存在显著性影响。为什么集中度会对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呢？自威廉姆森（Williamson）提出了“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高度的空间或者城市的集中有利于经济的增长”^[2]的假说以来，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假说进行了验证。克鲁格曼（Krugman）^[3]分别从信息溢出效应、交易成本的降低、市场规模的扩大、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匹配效率等方面考察了集中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另一些研究如戴维斯（Davis）和亨德森（Henderson）却发现威廉姆森假说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动，生产和人口的过度集中可能对经济增长存在阻碍作用，而生产和人口的集中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出倒“U”型曲线^[4]。

为什么过度集中不利于经济增长呢？从静态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和人口过度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一方面，这些城市的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将逐渐耗尽，而人均基础设施成本过高、过度拥挤等聚集不经济却逐渐增加；另一方面，亨德森和贝克尔（Becker）发现大量中小城市却投资不足，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5]。从动态来看，杜兰顿（Duranton）和普伽（Puga）认为一国生产和人口一定程度的聚集可以通过信息外溢效应促进技术进步，但过度集中却可能把本来可以应用于生产和技术研发的资源用于对城市交通和拥挤环境的改善，以维持在拥挤条件下人们的生活质量，这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6]。

日本是我国的近邻，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一直受到我国的极大重视。日本经济在战后近20年里以近两位数的增长率高速增长。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却陷入了一蹶不振的泥沼。进入21世纪，虽然日本政府大举进行信息技术和其他科技的研究投资，但经济增长形式仍未见明显好转。林文夫（Hayashi）和普雷斯科特（Prescott）发现，日本在1960~1973年的全要素增长率是6.5%，而在1991年到2000年的全要素增长率仅为0.3%^[7]。因此，他们认为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增长或技术进步的速度过低。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过高速技术进步的日本经济，为什么在90年代其技术发展水平却裹足不前呢？什诺扎基（Shinozaki）认为日本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以及日本的企业组织结构不适应信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导致了日本技术进步缓慢^[8]。但这些观点尚处在假设推理阶段，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实证检验，日本经济为什么会长期萧条至今仍是

个未解之谜。

为了考察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真正原因，与已有的研究不同，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详细考察了日本汇率变动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日本汇率变化对其经济增长率没有显著性影响；第二，详细考察集中度与日本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发现过度集中是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重要原因；第三，详细说明了过度集中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第二部分的四个经验性事实）。

二、为什么过度集中不利于增长：经验事实

1. 生产和人口的过度集中降低了有效工作时间和工作效率

一国的生产和人口过度集中，将造成该国交通过于拥挤，劳动力人均上下班通勤时间过长，这不仅减少了实际有效工作时间，而且由于早起晚归，承受上下班路上的奔波，压缩休息娱乐时间，劳动者需要在工作时间恢复体力和精力，必然会降低工作效率。

2. 生产和人口的过度集中扭曲了资源配置，降低了投资效率

布莱克（Black）和亨德森的内生城市增长模型指出，一定的城市规模可以促进技术外溢，但城市过大，大量的资源将会从生产和技术研发领域转向改善城市交通和拥挤的环境，以维持居民的生活质量^[9]。由此可以推论，一国生产和人口过度集中的程度愈高，该国上述资源配置的扭曲愈严重，总体投资效率可能会越低。此外，一国生产和人口在少数大城市过度集中，必然导致大量中小城市投资不足，发展迟缓，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这从另一个方面扭曲了资源配置，也降低了总体投资效率。

3. 生产和人口的过度集中降低了技术进步的效率

亨德森认为大城市往往是进行一国科技创新的实验中心，从事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设计^[10]。如果大城市规模过小，则缺乏科学实验的环境，影响全国的技术进步；但如果大城市过大，人们不得不在通勤交通上和其他浪费性活动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并从本该用于科研实验的资源中转移出大量资源用于改善交通和拥挤的城市环境，这必然阻碍技术进步。

4. 生产和人口的过度集中导致高房价和拥挤的居住生活环境，可能会降低人们进行冒险性创新活动的能力

一国生产和人口过度集中，必然造成该国平均房价上升，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尤其是技术创新的发源地——大城市的居民，面临更高的房价、更狭小的住房、更拥挤的居住环境、更少的野外娱乐休闲时间、更紧张的生活节奏和更大的生活压力（例如为了按时偿还房贷，按揭购房者甚至不敢更换工作单位，以减少可能无法还贷的风险）。这必然减少人们的冒险行为和抗风险能力。而创新性活动是高风险活动，过度集中通过更高的生活压力降低了人们的抗风险能力和减少了冒险行为，可能会降低人们的创新性活动。

三、汇率、集中度与日本经济增长：基于 OLS 的分析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之后的内生增长理论将全要素生产率解释为“人力资本”，并且把教育看成是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往往把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但是，正如前面的分析认为集中度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所以本文在分析中将集中度加入到模型中。同样，出于分析汇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中也包含了汇率变化这一变量。

自斯密以来，贸易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观念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贸易对于日本的经济增长存在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模型中，我们也考察了日本的对外开放程度对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经验研究中使用的是日本 1956 ~ 2004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并且所有变量的数据均来自日本官方统计局网站，或根据该网站提供的数据进行计算和加工

而得到^①。

1. 主要变量的界定

在本文中，日本的经济增长率 (*ggdp*) 采用支出法计算的日本历年 GDP 的增长率来表示；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率 (*gk*) 采用日本固定资产存量的年增长率来表示，当然依据惯例，这里的固定资产不包括住宅资产。日本的开放程度 (*open*) 采用日本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与支出法计算的 GDP 之比来表示。但是，由于这一变量是非平稳的，为了分析的便利，我们采用日本每年的进口总额与支出法计算的 GDP 的比值 *import* 作为其代理变量。这一方面是由于后者是平稳的；另一方面是由于 *import* 与 *open* 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 0.95。日元汇率采用的是经价格调整的日元对美元的比价。

与大多数研究人力资本的文献相同，本文采用教育水平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对于教育这一指标的度量在国内的研究中也存在多种不同的方法。陈钊等^[11]学者用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由于数据缺失，本文采用高中以上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与日本总人口之比表示日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变量 (*edu*)。对于日本劳动力投入增长率变量的选择，林文夫和普雷斯科特^[12]采用总就业人口与单个工人的周劳动时间的乘积来得到劳动投入指标。由于数据缺失，本文采用日本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增长率作为日本的劳动投入增长率 (*gl*) 的代理变量。

但是，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度量集中度。亨德森^[13]采用一国最大城市的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但是鉴于日本的国情，我们采用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大阪府、爱知县七个地区人口与日本总人口之比来表示日本生产和人口的集中度 (*concen*)。各个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 1。

表 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	ADF 统计量	检验类型	检验结论	PP 统计量	检验类型	检验结论
<i>ggdp</i>	-4.511 ***	(C, T, 0)	趋势平稳	-4.439 ***	(C, T)	趋势平稳
<i>dexrate</i>	-5.577 ***	(C, 0, 0)	平稳	-5.435 ***	(C, 0)	平稳
<i>edu</i>	-3.045 **	(C, 0, 0)	平稳	-2.707 *	(C, 0)	平稳
<i>gl</i>	-6.025 ***	(C, 0, 0)	平稳	-6.528 ***	(C, 0)	平稳
<i>concen</i>	-11.136 ***	(C, 0, 0)	平稳	-7.008 ***	(C, 0)	平稳
<i>concen2</i>	-9.122 ***	(C, 0, 0)	平稳	-5.782 ***	(C, 0)	平稳
<i>gk</i>	-3.237 *	(C, T, 3)	趋势平稳	-3.014	(C, T)	趋势平稳
<i>import</i>	-2.787 *	(C, 0, 0)	平稳	-2.814 *	(C, 0)	平稳

注：1. ***、**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2. 检验类型中 C 和 T 分别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3. *dexrate* 表示汇率的变化；*conen2* 表示集中度的平方。

2. 经验研究模型的设定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如下经验研究模型：

$$ggdp_t = \alpha_0 + \alpha_1 concen_t + \beta_1 gk + \beta_2 gl + \beta_3 dexrate_t + \beta_4 edu_t + \beta_5 import_t + \delta t$$

其中，*t* 表示时间趋势变量。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集中度 (*concen*) 和汇率变化 (*dexrate*) 的系数，前者反映的是集中度对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后者则反映了汇率的变化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上式 OLS 估计的结果如表 2 第 2 列所示。集中度对日本的经济增长存在不显著的负效应，汇率的变化对日本的经济增长也存在不显著的负效应。其他各个变量的系数中，只有物质资本增长率在 5% 的显著

表 2 基本 OLS 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i>concen</i>	-0.737	10.383	8.069 *
<i>gk</i>	0.161 **	0.152 **	0.160 **
<i>gl</i>	-0.093	0.624	0.303
<i>dexrate</i>	-2.475	-0.715	
<i>edu</i>	0.081	0.049	0.055
<i>import</i>	-0.374	-0.328	-0.302
<i>t</i>	-0.001	0.002	0.001
<i>concen2</i>		-17.555 *	-13.960 **
常数项	0.305 ***	-1.456	-1.085
观测个数	48	48	49
拟合优度	0.66	0.677	0.687

注：1. ***、**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2. 为防止自相关问题，回归中计算的是经 Newey-West 调整的标准误。

① 资料来源：<http://www.stat.go.jp/english/data/chouki/index.htm>

性水平上是显著的。但是这一模型可能存在遗漏重要变量的问题。为了对这一猜测进行验证，我们对该模型重新回归并进行模型设定偏误检验（RESET），检验的统计量为 2.53，对应的 P 值为 0.072，因此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模型设定偏误的原假设。

我们尝试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集中度的平方项 *concen2*，并重新估计了模型。结果显示在表 2 的第 3 列。集中度的系数在 1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而汇率的变化对于日本经济增长仍然没有显著性影响。集中度平方项的系数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同样，对此模型进行了模型设定偏误检验，检验的统计量为 1.32，对应的 P 值为 0.283。因此，加入集中度的平方项之后的模型不存在遗漏重要变量的偏误。

模型 2 的结果同样显示了汇率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因此，考虑将其从模型 2 中剔除进而得到模型 3。模型 3 估计的结果显示剔除了汇率变动之后，集中度及其平方项的系数更加显著。模型设定偏误检验显示的统计量为 1.13，对应的 P 值为 0.351，说明剔除汇率变化之后的模型 3 不存在遗漏重要变量的偏误。因此，以上 OLS 估计的结果表明，集中度及其平方项对于解释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性重要作用，而汇率变化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率没有显著性作用。

四、集中度与经济增长：IV 估计

依据集中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假说，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生产和人口的集中可以节省基础设施投资，利用技术外溢等；但是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拥挤成本凸显以及国家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带来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生产和人口向落后地区转移。基于此，亨德森认为集中度可能是一个内生解释变量^[14]。为了消除这种内生性，并与以上 OLS 估计结果进行比较，我们采用类似于亨德森^[15]的方法，使用集中度及其平方项的一阶滞后项作为集中度及其平方项的工具变量，使用广义矩估计（GMM）的方法对以上模型进行了重新估计；同时为了防止弱工具变量带来的问题，采用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法对以上模型进行了估计，估计的结果均显示在表 3 中。当然，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在所有的模型中都包含了汇率变化。

为了消除集中度的内生性，我们采用了集中度及其平方项的一阶滞后项作工具变量，进行两步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结果显示在表 3 的第 2 列。从估计的结果中可以看出，集中度及其平方项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性影响，但是汇率变动对于日本经济增长没有显著性影响。

在表 3 的第 3 列和第 4 列，我们采用 GMM 和迭代广义矩估计（IGMM）方法重新对模型进行了估计。二者估计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集中度及其平方项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而汇率变动仍然是不显著的。

为了防止弱工具变量带来的种种问题，本文采用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法（LIML）重新估计了模型，得到的结果显示在表 3 的第 5 列。从估计的结果中可以看出，采用 LIML 估计的结果与采用 GMM 和 IGMM 估计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本文采取的工具变量并非弱工具变量。同样，估计结果仍显示集中度及其平方项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而汇率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是不显著的。

作为对比，我们在表 3 的模型中剔除汇率变化，采用相同的方法，重新估计了模型，得到的结果

表 3 IV 估计结果

项目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i>concen</i>	12.903 **	12.903 **	12.903 **	12.903 **
<i>concen2</i>	-21.693 **	-21.694 **	-21.693 **	-21.693 **
<i>gk</i>	0.159 **	0.159 **	0.159 **	0.159 **
<i>gl</i>	0.822	0.822	0.822	0.822
<i>dexrate</i>	-0.013	-0.013	-0.013	-0.013
<i>edu</i>	0.057	0.057	0.057	0.057
<i>import</i>	-0.297	-0.297	-0.297	-0.297
<i>t</i>	0.003	0.003 **	0.003 **	0.003
常数项	-1.852 **	-1.852 *	-1.852 *	-1.852 **
观测个数	48	48	48	48
拟合优度	0.675	0.675	0.675	0.675

注：1. **、*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2. 为防止自相关问题，回归中计算的是经 Newey-West 调整的标准误。

显示在表 4 中。

对比表 3 和表 4 的估计结果, 我们发现剔除了汇率变化之后, 除标准差略有不同之外, 2SLS、GMM、IGMM 和 LIML 估计的结果两表无较大差异。比较的结果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汇率变化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可以忽略的。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的经验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集中度及其平方项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性影响; 其中集中度的系数为正值, 集中度的平方项的系数为负值, 表明过度集中对于日本经济增长存在阻碍作用。第二, 经验研究的结果并没有提供汇率变化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率存在显著性影响的证据。

表 4 剔除汇率变化的模型估计结果

项目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i>concen</i>	12.906 **	12.906 **	12.905 **	12.906 **
<i>concen2</i>	-21.697 **	-21.698 **	-21.697 **	-21.697 **
<i>gk</i>	0.159 **	0.159 **	0.159 **	0.159 **
<i>gl</i>	0.823	0.823	0.823	0.823
<i>edu</i>	0.057	0.057	0.057	0.057
<i>import</i>	-0.297 *	-0.297	-0.297	-0.297 *
<i>t</i>	0.003 *	0.003 **	0.003 **	0.003 *
常数项	-1.852 **	-1.852 *	-1.852 *	-1.852 **
观测个数	48	48	48	48
拟合优度	0.730	0.730	0.730	0.730

注: 1. **、*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2. 为防止自相关问题, 回归中计算的是经 Newey-West 调整的标准误。

五、结论及对我国城市化模式的建议

本文以亨德森的模型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理论为基础, 通过构建计量模型, 首先证实了必须在模型中加入集中度的平方项的必要性, 而以往的研究几乎没有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本文通过使用集中度及其平方项的一阶滞后项作为集中度及其平方项的工具变量, 采用 2SLS、GMM、IGMM 和 LIML 方法进行估计, 结果均发现汇率变化对于日本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而集中度及其平方项对于日本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性影响。

日本经济为什么会发生严重的过度集中呢? 尽管还没有文献专门研究过该问题, 但现有文献研究过其他国家过度集中的原因, 主要观点有: ①阿迪斯 (Ades) 和格雷泽 (Glaeser) 认为对大城市的倾斜性发展政策、财政集中体制是造成过度集中的政策性和体制性原因^[16]; ②托达罗 (Todaro) 等认为对大城市未来高收入的预期, 使大城市工人宁可接受当前的较低收入或者宁可失业, 也滞留在大城市, 是造成过度集中的市场原因^[17]。我们认为第一类原因在日本最可能存在。

我国当前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11 年我国城镇化率为 51.27%^①, 如果未来几十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70%, 那么将有 3.3 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中来。可以想象, 同现在相比, 未来几十年里我国生产和人口的空间布局将产生巨大的转变。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下面 3 种典型的城市化模式: ①“特大城市 + 快速交通系统 + 远郊区睡城”的日本城市化模式; ②“特大城市 + 贫民窟”的拉美城市化模式; ③大、中、小城市并行发展的德国城市化模式。日本式城市化模式在我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有研究认为: 一个城市无论人口规模及人口密度是高还是低, 只要它持续增长, 就说明它的空间聚集经济效应大于城市病带来的经济成本。这类研究忽视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式^[18]会造成过度集中问题的可能性。

另一些学者如陆铭等^[19]主张进一步加快沿海地区大城市的发展, 增强其积聚能力, 促进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聚集, 实现城乡和区域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本研究证明, 采用日本式城市化模式, 很可能使我国经济产生严重的过度集中, 最终将严重阻碍经济增长, 使我国经济进入类似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尽管由于我国大多数沿海大城市的人口数据和 GDP 数据的时间序列比较短, 而且在这些大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数据又非常缺乏,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采用本文使用的经验研究的方法定量研究我国的过度集中问题, 但是我国不少大城市过度集中问题已经有所显现: 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普通居民对房价之高、交通之拥挤无不抱怨, 外来农民工更是只能望房兴叹。根据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

①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1 年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 [EB/OL]. www.stats.gov.cn/was40/gjtj_nodate_detail.jsp?channelid=75004 & record=207, 2012-10-31.

(Mercer) 公司公布的《2009 全球生活成本》报告, 日本的东京和大阪分别是全球生活成本第一高和第二高的城市, 而我国内地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在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排名中分别名列第 9 位、第 12 位、第 22 位和第 23 位。

然而, 我国大城市生活成本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严重脱节的, 这对我国许多城市正在模仿的“特大城市 + 快速交通系统 + 远郊区睡城”的日本城市化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 我国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城市化, 如果采用日本式的城市化模式, 我国大城市过度集中问题将比日本更严重。这是因为一方面, 大量新进入大城市的人口, 包括农民工和就业不久的原籍在中小城镇和农村的大学毕业生, 很难在大城市安居乐业; 另一方面, 根据本文的研究, 从长期来看, 严重的过度集中将很有可能通过降低我国劳动效率、投资效率、技术进步速度和人们进行创新活动的的能力, 最终使我国进入类似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模式只能采取大、中、小城市并行发展的模式。为此, 我国应当采取适度控制大城市规模, 鼓励中小城市发展的城市政策, 从而防止我国生产和人口在大城市进一步过度集中。另外, 如何收集到可靠的数据, 定量研究我国的过度集中问题是未来一个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1] 王义中, 金雪军. 汇率升值、紧缩性政策与经济波动——中国会重蹈日本覆辙吗? [J]. 金融研究, 2009, (2).
- [2] Williamson, J.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65, (6).
- [3] Kur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 (3).
- [4] Davis, J. C., J. V. Henderson. Evidenc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3, 53.
- [5] Henderson, J. V. and R. Becker. Political Economy of City Sizes and Formation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0, 48.
- [6] Duranton, G. and D. Puga. Nursery Citi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
- [7] Hayashi, Fumio and Edward, Prescott. The 1990s in Japan: A Lost Decade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2, (5).
- [8] Shinozaki, Akihiko. Can the Sun Rise Again in the Ubiquitous Information Ag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6, 72 (5).
- [9] Black, D. and J. V. Henderson. A Theory of Urban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 (7).
- [10] Henderson, J. V.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So-what Ques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3, (8).
- [11] 陈钊, 陆铭, 金煜. 中国人力资本和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 基于面板数据的估算 [J]. 世界经济, 2004, (12).
- [12] 同 [7].
- [13] 同 [10].
- [14] 同 [10].
- [15] 同 [10].
- [16] Ades, A. and E. Glaeser. Trade and Circuses: Explaining Urban Giant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 1995, 110.
- [17] 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ment Countrie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1969, 59.
- [18] 同 [17].
- [19] 陆铭, 陈钊.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J]. 世界经济, 2008, (8).

[责任编辑 冯 乐]